

陶克涛 著

毡乡春秋

拓跋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毡乡春秋
拓跋篇

陶克涛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毡乡春秋·拓跋篇

陶克涛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50千

1997年3月第一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204-01332-8/K·71 定价: 18.00元

序 言

荀卿讲：“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这话不错。我这里正是从“疑疑”开始；而欲以释疑作结的。主张“信信主义”。

本书是诸多论文的辑合。叙述角度虽然各有侧重，而持经施纬则终成条贯。它的主旨不在一般地以专讲拓跋故事为务，乃在试图再现拓跋之在毡乡的某些声容，而闾闾者，尤在它的始初名实的可疑与辨识。

探源索委，原始要终，不光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惯习，也是放眼历史、总结教训以警尔后的常经，而“探源”与“原始”更是“索委”及“要终”的基因和诱头。研究长江、黄河的流派，犹要溯其星宿泉渊，整刷一族百代之史，更不能弃此而轻心。对于拓跋族原源探讨的必要，亦须作如是观。不是说“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吗？追溯拓跋“先祖”正所以征实它的“本”即实质的基础。拓跋究何所自来，毕竟是“魏”史应当究明的开篇第一章。

我尝设想：南下拓跋之为族，可谓“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其“生命力”是极其有限的，今天在当年的“魏”地还有谁能脉脉地找到他们的踪迹？但是它的“运遇”很可能是个先例，毡乡历代诸族直接、间接起而因仍步其后尘的，何啻一个？即其起始，

亦颇有可以推衍的余地。以此而论，则南下拓跋起脚之点的寻绎，不特之于拓跋本身有其切要，即对探究毡乡其它类例，亦不无举一反三的学术意义。

北魏建业有成，而拓跋之为族，亦渊源有自。然而关于他们南移之前的状况，拓跋人自己如何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记录、姓氏《世本》；也没有足以凭信的原始遗址与遗物，人们于今已无从确悉，南下的拓跋统治者也讳莫如深。毡乡别族的连类记述或传说，能不能据以一一印证，似乎也难以遽作牵强。现在可见的只是在《魏书》的那篇独一无二的《序纪》里，有关于它的一些感笔，而这已经是汉文史臣的转手货色、次等资料了。

《魏书》虽然主要为私人编撰，却曾经获官家认可。其涉笔诸事，据说也有前代或前人成卷可考，并不了无的据。后世经过“宸断”，又被列为“正史”。在所谓“正史”为史学之本的传统认识影响下，人们因此奉之为研究拓跋史事的“宗主”。待到本世纪八十年代嘎仙洞汉字刻石一出，这篇《序纪》更被允为考证拓跋远祖的绳墨了。

《序纪》不宜抹煞。在被尊为北魏始祖——力微以前时期，正面地说，它毕竟生造出一条可躡迹拓跋始初的缥缈线索。使无此一着，后人的窥探恐怕就要另作徘徊；而从负面说，则正是从它的字里行间，启发着人们的考索思路，因此在《魏书》之外别无更多的有关记述的困境中，这个《序纪》应当是唯一须要凝神的所在。而嘎仙洞石刻既被定为《序纪》的实物支柱；证史的“丰碑”，当然也应随之分外予以瞩目。

然而《序纪》关于拓跋渊源的敷衍，真的反映拓跋真实？真的那么铁把牢靠、信而有征吗？刘知几曾经指出：“魏收自我作故，无所宪章。语必不经，名必骇物。”（《史通》）这话不曾有人异议，而于拓跋始源尤为得窍。那么，《序纪》的不足为凭，应当是必然

的了。事实上，先前也确曾相继有人持疑过，这表明他们慎思审问的功力。可惜大多也只止于疑而废于辩，更深的论证殊少见闻。这自然存在着困难：文字记录憾缺；地下文物难觅；时间这么久远；成说已经定型。要想比勘资料，互为证补，彰疑别微，破瓠为圆而为人所首肯，并不易易。然而蹈常袭故，因疑就疑，致谬种流传，终究不是“疑”的归宿。这里需要破除迷信、敢为学界倡的勇气。

我对于魏事，极少经心。然读《魏书·序纪》，却颇不惬其说。兹不惭简陋，略踵前人疑路，且抒愚者之得。当然也是如《庄子》所说。“尝试言之”的。既不十分成熟，也不足以为定见，而书中引述，也只在订伪规过，考信质疑，绝非意在苛刻前贤，没人功绩，这是应当说明的。清人钱大昕说：“学问，乃千秋事。”后来黄节也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实为确论。作为本篇主题，拓跋始原的是非正误，正需“天下”公论；要待“千秋”验证，一槌定音是办不到的。因此，我的这些释疑之说，只能是一块引玉之砖，存此一说而已。书稿既竟，愿作如上关说，是为序。

陶克涛

1990.8

目 录

序言	(1)
第一卷 拓跋渊源说疑	(1)
篇一 引言	(1)
篇二 “所当防其流弊”	(12)
篇三 惊蛰蝶	(25)
篇四 巫书之亚	(34)
篇五 出人意料的事	(47)
第二卷 拓跋先代辨惑	(60)
篇六 踏遍山陵无觅处	(60)
篇七 幽都的不胜芥之水	(70)
篇八 “推寅”之类	(85)
篇九 不必是失据的	(109)
第三卷 拓跋旧墟发覆	(132)
篇十 踵前人之路	(132)
篇十一 自造的“世本”	(155)
篇十二 刊祝	(174)
篇十三 旧墟？石庙？	(197)
篇十四 不了了之	(208)
第四卷 六镇风云析歧	(218)

篇一	天有二日	(219)
篇二	阴山两麓	(225)
篇三	众心日堕	(232)
篇四	“逆命”之英	(241)
篇五	猎猎旌旗卷残云	(249)
篇六	千古	(259)
第五卷	走向	(265)
篇一	“形便之利”	(265)
篇二	新遇	(274)
篇三	“国步”阴山略	(282)
篇四	自种黍离	(293)
书后		(301)

《毡乡春秋·拓跋篇》

第一卷 拓跋渊源说疑

——“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唯千万人，虽千百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不必附和雷同也。”

——《习斋先生言行录·学问篇》

篇一 引言

毡乡民族的历史活动——“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①亦如世界其它民族的历史活动一样，不论经行多少世代；也不论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

如何起伏波折，它始终被一条遍及各个实践领域而难于绝断的巨大链条所贯串。这根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可以确信都是由无数颠扑不破的真实所铸成。真实——不论好的、坏的；对的、错的，这就是民族历史实践的本质。自然，它也应当是历史篇章的骨骸。历史实践不可能是由虚伪构成的。然而作为一种反映，它在人们的观念里，却常常以被扭曲的形式出现。在史前时期，随着岁月的消磨，口口相传，传疑传信终于竟被越来越多的以讹传说相代替。在历史时期，适应某种、更多的是政治需要，在书面上、金石铭刻里，它都不是被如实地、按照它本来的或应当有的样式予以记录，而是听由惯于造作的史官与史匠们移宫换羽，以致失去本色。简直地说，历史真实从其最初起，就不幸被很多史家额外的虚构、伪造所浸染，而后世的秉笔者更从而有意或无意地郢书燕说，层累地增饰，乃至史事变得疑信参半，甚且以伪充真了。这种情况在记述拓跋祖源及后世的论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宋人王安石《读史》诗所谓“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黠闹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实在不是信口而言的。它甚至使人怀疑就是对《魏书》及其崇尚者而说的。但是，这种经过伪饰的东西，虽然可能富于浪漫色彩或诱人的魅力，因而可能如培根所说给人一种心理上的满足，然而却不是历史生活的再现；不能给人以历史的前鉴。这里不妨从《魏书·序纪》说起。为此，先谈一下人们关于嘎仙洞石刻的论列。

1980年，北国的探索者们因缘际会，偶然而又不偶然地在大兴安岭的一个岩洞——嘎仙洞内壁上，于拂拭尘封及剥洗苔钱中，竟使一处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太武帝拓跋焘的汉字祝文镌刻，一瞬之间复见于天日。千载古迹，一旦发覆，消息传开，自然是各方嘉许。从那以后，诸多书刊相继揭出各家的论证，

以为“嘎仙洞遗址确为拓跋鲜卑远祖旧墟石室，是无可怀疑的。”^①它“与《魏书》所描述的基本相符。嘎仙洞一带是鲜卑族祖先活动的地方。石室的发现结束了关于鲜卑旧墟石室所在地的公案。”^②它“确定无疑地证实了《魏书》所载的真实性。”^③它证实了“史称之大鲜卑山，应该是今天的大兴安岭北段；鲜卑民族的发祥之地也应该就在大兴安岭北段。”^④它也“证实了大鲜卑山应在鄂伦春自治旗。”“证实了拓跋鲜卑的先祖是从大兴安岭东麓越过大兴安岭，经过大兴安岭西麓，进入呼伦贝尔草原的。使《魏书·序纪》所载拓跋鲜卑的迁徙史实，得到了石刻的旁证，并看出这些记载的可靠性。”^⑤“刻文的发现，证实了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祖先居住过的旧居，从而解决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大鲜卑山’的地理位置问题；证实了森林茂密的大兴安岭，富饶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就是拓跋鲜卑族的摇篮。”^⑥甚至认为“嘎仙洞规模之宏大，与《魏书·乌洛侯传》记载相合，完全具备祖庙的神圣威严。”^⑦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一，嘎仙洞“确定无疑地”是拓跋人先祖——昌意少子的“神庙”；二，拓跋人即鲜卑人；三，大兴安岭或它的北段即是“大鲜卑山”；四，这一带“无可怀

① 《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第123页纪游《一个千古求索的重要史迹》。

② 《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年第328页文物处供稿《嘎仙洞鲜卑石室》。

③ 《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第15页于志耿、张秀仁《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

④ 《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第78页吉发习《嘎仙洞调查补记》。

⑤ 《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42页。

⑥ 《内蒙古自治区概况》第276页，1983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⑦ 《民族研究》1982年第6期第29页陈连开《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

疑”地是拓跋鲜卑人的最古源地；五，嘎仙洞刻文证实了魏书的记录。嘎仙洞石刻不误；《魏书》文字也很可靠；六，拓跋人南迁，即从此出发。这就是各文论证嘎仙洞刻文并因此而究及拓跋人源地的异口同声、彼此呼应而又相得益彰的结论。类此詹詹者，如果不限篇幅，本来还可以信手罗列一些。

我历来的印象是：所谓拓跋人族属鲜卑；起始于大兴安岭地区；并从此而南移云云，这种依违《魏书》而发挥的设想，在中外史学界似乎已经因循很久、流衍很广，并习惯地在轻信者中成为定论。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声音之在一些人中其实也并没有完全绝响，接口而诵之的，也还不曾少见。当然，通行的说法不必都误，但说都对，怕也未必。嘎仙洞刻文的复现，具有珍贵的文物意义，而就历史资料这点说，它也应当引起人们的注视。因为它不光没有能够否定自来的成见，反而被视为给那些见识（如以上所引名家的话）提供了一种文物的证据。它是“丰碑”！我的兴趣也恰恰是因它而生发的。

我不反对，不，勿宁说，我赞称任何有关石刻、首先是嘎仙洞刻石并由此而引发拓跋史事的论列与推衍的尝试——即使是旧调新翻或新腔旧唱。我甚至愿以高度尊敬，评价诸如以上各论的直率与明鉴。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研究任何事时，都要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①中国的古话也讲“揆端推类，原始要终”。事物渊源的探究，的确必不可少。世界上没有无起源的事物，事物的起源也无不有其所以起源的客观前提。不究明这个起源及其前提，而要发现并把握它的特定发展过程与必然结果，其可能的困难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从史学与考古的角度客观地评价例如嘎仙洞刻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0页。

并因此而连类究及拓跋人的族类渊源，探骥索隐，凿凿有据，从而使这个民族的早期史事尽可能在迷茫中较切近地还原于真实；使史书徒然加在它身上的各种伪饰得以一层层地剔除；使历来因仍以倡的成见借以逐次澄清；使拓跋历史规律的探索得以有个较可靠的基石；当然也使这块刻文的本来旨趣有幸能够稍稍被揭示，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从任何学术意义上说，都是值得的。哥德说过：“历史家的任务在于区别真实的和虚伪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并不只是这个，但是至少在基本上，科学的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不就应当这样吗？

在历史上，北边诸族的兴替中，拓跋人较之它的先代，或者曾经显现出异样的形影。起先，它无非是一个幽居僻地的蕞尔小族，难称轻重，而后则不堪险涩，终于隐鳞自谋了。它陡然间步履前代的后尘，把自己的眼光转向南天。几经长途跋涉，图谋易地殖民。风云际会，因应变化，耗岁费月，意外地竟被成就为顾盼自雄，称“代”称“魏”的一方强国。“西吞河右，东举龙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虽裂土分区不及魏晋，而华氓戎落，众力兼倍。”^①能“地兼万里”，“众力兼倍”，这就足够使它雄张一时了。终魏之世，它南与“岛夷”划江峙立；北向“旄头”越塞穷兵。金戈铁马，折冲尊俎，横行半个禹域，鼎祚竟至一个半世纪之久，其造就一方一代的功烈，不能谓之微不足道。就是在它的盛乐时代，至少在当地也做了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不少业绩。但其残破与影响于周边各族者亦不能不谓之至深且巨，而周边各国之作用和浸蚀于它的效应又岂可以浅鲜视之？正是拓跋人开创了“夷狄”而“夏”、以“夷”制“夏”的先例；也正是拓跋统治者衅动起南北

① 《宋书·索虏传》卷95。

对峙而又以北攻北（柔然）的史例。当然，也正是拓跋人自己开了北族自毁其族，自毁其国的先河。拓跋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祸乱北国的历史。清人张之洞有《哀六朝》诗：“神州陆沉六朝始，疆域碎裂羌戎骄。”神州“碎裂”，桓温曾经呵责清谈诸人，说“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能不任其责。”^①其实，就根本而言，“五胡”之余，拓跋进兵，尤为“羌戎骄”之戢。然而“陆沉”的又岂止神州？因此，探讨四至六世纪中国北方各族的悲欢离合，实在不能无视拓跋，而考察这一时期的毡乡（包括盛乐地区）兴衰、部落进退、制度变迁以及风情趋向等等，亦不能置拓跋于不顾。然而拓跋云云，究竟是谁？是何族属？祖居何地？世系真伪？因何而迁？路经何所？《魏书》所述何所凭据？如此等等，至今都还不能谓之已经详载史册，而诸家论证已足成圭臬，因而可以放心地说一声“结案”就能够解决的史学问题。至于洞刻本身的稽核，也还未便可以断言真理已被说尽，余子无庸置喙了。

探讨一个民族例如拓跋族的原始，最可靠、最直接、最简易的依据，当然是本族人的记录——依据当时、当地、当事人的真实记录以及他们的实物遗存，然而正是在这里，事情不尽如意。关键是拓跋人没有自己可称为历史的著录，至少没有尚存的文字记录。

就总体而言，拓跋人似乎浑然是一个自满于文盲的民族。它的始初固然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即使它在别人的土地上称“代”建“魏”之后，它也没有利用已有的权力优势与可能条件，设法创制自己可能足以反映固有语言的文字，并且也不见它的各届朝庭曾经表示过这种制作的丝毫意向。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曾经在他即位之初，诏旨“初造新字”，以使汉字“永为楷式”而令

① 《晋书·桓温传》卷98。

“文体错谬”得以纠正，然而即使他，也还没有像后世的契丹、女真及蒙古统治者那样，想到他本族的文字制定。因此，尽管拓跋人的脚步曾经震撼着大地；它的声音曾为四方所惊愕；尽管它开创了敢于睥睨世界的霸业；经历了从小到大、自北而南；转弱为强、由逆而顺的久远过程；品尝过内外交困的熬煎，并在所有这些实践斗争中也迸发过它的智慧与才能，而适应客观历史的需要，以如实地用自己民族的文字记录其先世闳阔及总括这些可以称作烈烈功业的典籍，却无一册遗世。勿庸违言，北魏作为一个中国的朝代，它的开国之主——拓跋珪，出于网罗汉族“士人”及汉化自己的目的，曾经诏令广收汉文经籍典册，然而却不见有过征集拓跋耆献掌故的片纸敕令。在他们的建业之初，也确曾应朝士的请求，有过史官的设置，却不见有拓跋人充数其间；他们也曾徒托空言“修国史”，却不见有什么成就，而且随着时间的递变，特别是自代（今山西省大同地区）迁洛（阳）之后，这种应景的虚设，已经愈趋沦落。高祖元宏被誉为“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之主^①。然而他如何“曰若稽古”，并无下文。实际景况据高崇说是“秘书图籍所在……纍素委积，盖有年载。出内繁芜，多致零落。”^②“白衣修史”的李彪更指出：“史官叙录，未充其盛。加以东观中圯，册勋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③可以说一片荒凉。堪以提及的倒是私人间，每有踏袭前代修史遗风者。世宗（元恪）时（490—515），李彪曾经报道著作郎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等，并有记述，然而都“弗终茂绩”。李彪自己虽有“并取前书，撰为国书”的谋算，

① 《魏书·儒林传》卷84。

② 《魏书·高崇传》卷77。

③ 《魏书·李彪传》卷62。

但是到底“载笔遂寝，简牍弗张。”^① 可谓一事无成。其实这已是元魏岁月的末造了。前此，可能涉及拓跋初时史事的著录，北地人梁祚有《国统》、《代都赋》；安定邓渊有《国记》（亦作《代记》）；清河崔浩有《国书》并“立石铭刊，显在衢路”。梁祚《国统》不知所云，而邓“渊造十余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② 即使如此，其书所述也只限“代”时，而着重的是太祖纪。^③ “逮于太宗，废而不述。”^④ 崔浩所撰也不过“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⑤ 即使“尽述国事，备而不典，”^⑥ 且亦重在太宗、世祖朝事^⑦ 其于前此时期史事，则难说有一字之及。山东人崔光在太和初，也曾“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⑧ 其子崔鸿撰《十六国春秋》百卷，但是，“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⑨ 据此，则崔氏父子所述，也还是未及拓跋祖先之事。不光如此，更须着重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撰史者，没有一个是拓跋人；其书也没有一卷是以拓跋文字写缮的。当然不能抹煞他们的一笔之劳，然而《春秋》之笔、夷夏之辨的修史传统，不能不使他们在史事取舍、文字措词上，难免成见或偏见循事。公元450年崔浩的“国史”惨案，无论后世文人如何猜测或评证，而其中民族成见应当是有以引发的可能原

① 《魏书·李彪传》卷62。

② 《魏书·邓渊传》卷24。

③ 《魏书·高允传》卷48。

④ 《魏书·崔浩传》卷35。

⑤ 《魏书·李彪传》卷62。

⑥ 《魏书·崔浩传》卷35。

⑦ 《魏书·高允传》卷48。

⑧ 《魏书·崔光传》卷67。

⑨ 《魏书·崔光传》卷67。

因之一。从那以后，不特私家无人敢伏案做文，即国家而言，“史官遂废”。直到公元460年，始复置史职，但是一无所成。

一个民族、一个自有历史实践的民族，不自操史觚，不自撰其史，对于自家身世渊源，不明所以；对于本族文化传统，弃之唯恐不及。累世昏昏，并以此而昏昏其后人，此无以名之，直可谓之自毁其史，而毁史则是所以毁族的初阶。自毁其族！这是比自毁其国尤为不肖的。这种状况却长时不见有人起来自谋所以改变的迹象。到肃宗时（公元516—528），拓跋人随着其族势国运衰微、文史跌宕，似乎一觉醒来，开始感悟到史的重要及本族人自修族史的必要。山伟就向身膺上党王的元天穆及仆射尔朱世隆陈述：“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①这里的所谓“代人”乃指拓跋人；所谓“余人”即指非拓跋人。他的意思明白得很，拓跋史应由拓跋人自修。他为什么忽发此想，夫子不曾自道。后人无从得悉，魏收说他是在“谄”上党王及尔朱世隆。“谄”不必绝无，而“余人”修史之民族偏见或亦使然。但是，他的呼吁不过是一挝暮鼓而已。当时的北魏已经日薄西山，在位的肃宗不过是十八岁的娃娃，专权的灵太后是安定汉人，虽不必庸愚，然正秽乱中宫，废弛朝政，而各地的反抗义旗却波翻浪涌，戟指目怒。在北魏统治者已经如此俾焉如不终日的时候，谁还有兴致追思远祖故事，以振刷民族而治史图新？所以山伟等虽然妄想以此自励，终究得不到朝廷的支持，以致只能“守旧而已，初无著述，故自崔鸿之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公元516—534），时事荡然，万不记一”，终于招致“后人执笔，无所凭据。”^②魏收说“史之遗阙，

① 《魏书·山伟传》卷81。

② 《魏书·山伟传》卷81。